

帶有生命體溫之作（序）

楊慶祥

在中國當代文學的版圖中，「台灣文學」長期以來都是比較曖昧的存在。地緣政治、歷史因果和意識形態的複雜糾纏，構成了一個難以清晰言說的「台灣文學」。就我個人的教育和閱讀經驗來看，在早期大學中文系的教育中，「台灣文學」一直是空白的一塊，文學史裡面既沒有相關的論述，教授們在課堂上也鮮有提及。

回憶起來，我最早接觸到「台灣文學」是在我讀研究生階段，第一次讀到的台灣作家作品，是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這部作品因為跟羅大佑的流行歌曲同名，因此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以至於後來對台灣的想像，長期停留在這樣一個「孤兒」的意象中。

再次對「台灣文學」產生興趣，是在二〇一〇年左右。當時我博士畢業留校任教不久，要給研究生開一門選修課，我雄心勃勃地以「東亞的主體」為研究課題，試圖以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日本、琉球等地的當代文學為原點，從中反思「東亞主體的建構」這樣一個歷史性的文化命題。

我的研究計畫雜亂，當時列入的作家作品有胡淑雯、駱以軍、魏德聖、董啟章、村上春樹、青山七惠等等。當時我的認知是，這些作家的書寫和「當代史」有著密切的關聯，通過

他們的作品，可以發現書寫的意識形態，以及這一意識形態背後的政治歷史架構，並能從「精神美學」的角度來闡釋「主體」的問題。對這一問題的關切，與我當時的困惑相關，當年我深陷於虛無主義和存在主義，又在一種無力卻不甘心的小資產階級矯情中掙扎。我在村上春樹的小說中讀到了這種無力感，同時又在竹內好對岡本庸子的回應中，意識到了對這種小資產階級習氣進行克服和超越的必要性。非常遺憾的是，因為種種的原因，這一研究計畫最終流產，僅僅是完成了幾篇長短不一的論文。

二〇一〇年前後，因為新舊千年的交替，對歷史的反思和對未來的期待，成為一種看起來很正當的心態，無論是在「菁英」文化的層面還是在流行文化的層面，都有一種假想的大和解氛圍。我之所以稱這種大和解氛圍為「假想」的，是因為我其實有一種隱約的不安，覺得二十世紀的歷史並不會如此簡單地消逝，而千禧年以來的政治經濟走向，也並沒有如自由主義所宣稱的那麼理所當然。個人主義的溫情固然有其歷史的合理性，但僅僅是個人主義的溫情，並不能冰釋歷史的創傷和罪惡，對歷史的反思，也不能停留在個人療癒的層面。我在二〇〇九年看到了魏德聖導演的電影《海角七號》，後來又在台灣看到了他導演的《賽德克·巴萊》，據說魏德聖是想先拍《賽德克·巴萊》再拍《海角七號》，以實現其「大和解」的文化訴求，但現實顛倒過來的順序恰好證明了我的判斷，在政治經濟結構未曾改變之前，大和解是虛妄的。而對於書寫來說，如果未曾深入到對政治經濟結構進行歷史性的描述和剖析，藝術也將失去力量。

以上是我閱讀台灣青年學者黃文倩的《靈魂餘溫》時想到的一些題外話，雖然是題外之言，但細想起來，似乎總有某種內在關聯。我認識文倩已近十年，以前在會議上聽過她發言，也在私下裡曾和她長談，這一次系統地閱讀《靈魂餘溫》中的近二十餘篇論文後，對她的研究旨趣和學術造詣，才有了較全面深入地體察，這時候也更加明白，雖然在兩岸不同的語境之中，有完全不同的經驗史，但借助文學和書寫的媒介，我們居然在很多時候心意相通，並在精神和歷史的層面上，找到了互相印證的地方。一個小小的明證就是，當年在「東亞的主體」研究計畫裡面的一些作家作品，同樣出現在了文倩的這部論文集中。這讓我覺得欣喜且親切。

具體來說，《靈魂餘溫》在以下幾個方面體現了文倩的個人研究特質與風格。

其一是開闊的政治社會學視野。開篇長文〈新世紀台灣現代小說中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以胡淑雯、黃麗群、徐譽誠的代表作為例〉，分析三位台灣作家小說中的底層書寫，雖然有大陸新世紀以來的底層書寫作為參照系，但文倩顯然不滿足於作一種簡單的比對式的分析。她敏感地意識到，台灣作家的底層書寫有其獨特的歷史樣貌，那就是在資本主義邏輯已經內化為一種審美經驗的前提下，這些對於底層的書寫往往被女性主義之類後現代的理論名詞所遮蔽，而無法直指問題的本質。文倩所關心的是：「這些人民如何安頓與發展他們的人生？跟台灣社會與現代性發展呈現出什麼樣的相互生產關係？」。我也曾經對胡淑雯的〈浮血貓〉大感興趣，並隱約地意識到其成長型敘事背後所觸及到的歷史病灶。但因為對

戰後台灣的歷史並不十分瞭解，也缺乏一種切膚之痛，因此，我的論述主要在現代主義和反現代主義的框架中展開。而文情則將問題的鋒芒直接切入到歷史的肌理，指出這樣的書寫終究流於幻覺，「她們看待人物的生命困境都有一定的社會視野，並不會以完全天真的姿態來毀滅主體，然而，黃麗群也跟胡淑雯一樣，在台灣戰後長期沒有左翼文學淵源的視野下，儘管意識到弱勢者的困境，但不認為社會、或身為作者的人，有辦法與責任去面對甚至解決它們，因此〈入夢者〉最後的收尾方式，成全的不免只是一種過於冷靜且平庸的洞察。」我贊同她的觀點，同時也意識到對於這一代作家來說，因為缺乏政治社會學的視野，往往不能自覺地反抗和批判，人物和故事的呈現，往往也因此流於淺薄。黃文倩稍具左翼色彩的批評，在政治社會學視野中進行症候性的分析建構，因此具有更積極的意義。

其二是文本的互讀。左翼批評在大陸曾經給人留下過刻板的印象，重宏觀而輕細節，重主義而輕修辭，重闡釋而輕材料，即使在接受了完整學院訓練之後的大陸青年學者身上，也遺留著這種慣性。我記得文倩有一次曾非常認真地問我：「為什麼大陸的學者與批評家寫的文章，前面都沒有前期成果的蒐集和概述？」這一提問讓我很是慚愧。文倩的文章則不然，據我瞭解，她每每有所想法，首先都要做大量的前期準備工作，盡可能佔有更多資料才開始文章的寫作。她師承著名學者呂正惠先生，呂先生以研究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為本業，其嚴謹寬闊的學術思路，也被文倩繼承了下來。《靈魂餘溫》中的論文，如談及〈浮血貓〉中的四條支線，對石一楓〈世間已無陳金芳〉中「精神」與階級的分析，還有對張楚作品中小鎮

情結的論述，無一不見出其細膩入微之處。這不僅使得她的理論根基具體而扎實，更讓其邏輯和論點富有說服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本的細讀在文倩這裡雖然亦有新批評式的內涵，但總體來說，又不止於新批評對文本內部的細讀，而是將社會文本、文學文本和歷史文本涵括融合予以互讀，由此生產出更開放的空間和內容。

其三是帶有生命經驗的體溫。文倩曾有數篇論文談及路遙，在學理之外，我看到的還包括某種與己相關的經驗反省，如果說這裡面有某種問題意識，也是從自我出發的內置於生命經驗本身的疑惑和追問。這讓我想起當年我對路遙的關注，不也正是自我困惑的一種延展？文倩雖然長我幾歲，但從代際的角度看，大概還是屬於同代人吧。對我們這一代人而言，學術不是職業的需要，而更是精神的需要，如果是職業的需要，或許做做講章式的八股文就可以了，但因為是精神的需要，就不得不時刻以生命的經驗與之周旋。文倩有這方面的自覺，這些年，她在世界遊走，僅僅是中國大陸，就去過了不少的地方，她用腳步丈量，用眼睛與身體觀察生命與文學。

突然想起有一次我問文倩，一個人在世界上遊走，不害怕嗎？我記得文倩回答我：「不會啊，因為我就是那種世界走遍遍的女生啊」。這讓我想起一九六〇年代的一些青年，一封信，一個背包，就可以投身到陌生的地方開始新的生活——今天這樣的生活方式已然不可多見了，更多是蝸居在資本匯聚的大都市做小資產階級的白日夢。但如果有一天聽到一聲召喚，世界史是否會重寫？

期待文情的再一次出發。

二〇一七、七、廿七

楊慶祥，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目次

帶有生命體溫之作（序）		楊慶祥	I
-------------	-------	-----	---

第一輯 閱讀台灣文學

新世紀台灣現代小說中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		3
——以胡淑雯、黃麗群、徐譽誠的代表作為例		
台灣解嚴後文藝理想主義者的主體困境		
——以邱妙津〈寂寞的群眾〉、賴香吟〈翻譯者〉與《其後》為例		21
後現代台灣的「異鄉人」——讀劉梓潔《父後七日》及其它		51
台灣戰後底層勞動小史——讀吳億偉《努力工作》		67
事關痛癢——讀志文先生的「記憶三書」		75
愛的變奏，人間氣息——閱讀林婉瑜		85
內向者的逆襲？——讀黃麗群小說		103

第二輯 閱讀大陸文學

底層的「精神」幻象及其生產——論石一楓〈世間已無陳金芳〉	117
旁觀者的介入與限度——以呂途與梁鴻的「打工」書寫為例	139
情感教育——讀王安憶的「三戀」	157
召喚路遙——兼談其敘事困境	169
逃避中的自我追尋——重讀董啟章〈安卓珍尼：一個不存在的物種進化史〉	177
人在「中途」——讀張楚〈長髮〉	193
讀石一楓《我在路上的時候最愛你》	201
那些孤寡殘弱者的抵抗與救贖——讀路內《花街往事》	209
地壇印象——讀史鐵生〈我與地壇〉	221
中國夢的焦慮——讀文珍小說〈我們夜裡在美術館談戀愛〉及〈安翔路情事〉	225

第三輯 文學／文學批評的再閱讀

讀洪子誠先生《閱讀經驗》	237
但開風氣——王曉明和他的《橫站》	245
一種歷史的見證——呂正惠的現代文學批評	253

在普世與入世間——七〇年代後夏志清的現代文學批評	261
具有創造性與社會介入的文學批評如何可能——兩岸青年學者談羅崗《英雄與丑角》	279
代後記：遙寄蕭紅、丁玲	295
主要參考及引用文獻	301